

「王道理想國」的誤入歧途與無力回天

● 胡悅晗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2000年3月18日，台灣總統選舉中的首次政黨輪替宣告了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的終結。號稱代表本土原住民階層的民進黨一面宣稱台灣進入了「真正的民主階段」，一面借「2·28」等歷史事件肆意渲染族

群意識，將國民黨妖魔化。這一現實中的民主政治轉型，引起了林志宏的思慮。他沒有為這個「新紀元」歡呼雀躍，而是返溯歷史，考察近代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時代」中，那些對故國舊君懷有無法割捨之情的清朝遺民的政治訴求與文化認同，進而理解現代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思想交錯互動的複雜與變化。這一成果的初稿成文於作者2005年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提交的博士論文，終於以《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的面目在2009年出版問世（以下簡稱《民國乃敵國也》，引用只註頁碼）。

作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作為全書的分析視角。這一概念的定義在西方學界一直眾說紛紜。在歷史學層面，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通過政治儀式考察文化典範。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注意到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政治對文化的挪用（費約翰著，李恭忠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5〕）；洪長泰將「政治文化」的內涵從精英擴大到社會關係與文化之間的互動（洪

作者返溯歷史，考察近代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時代」中，那些對故國舊君懷有無法割捨之情的清朝遺民的政治訴求與文化認同，進而理解現代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思想交錯互動的複雜與變化。

作者從日常行為角度入手，深入清遺民的內心世界，展示出一幅清遺民與其時代交織互動的圖景，將清遺民的政治訴求與身份認同這一宏觀問題放入日常生活的微觀領域考察。

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作者在本書中對「政治文化」的定義是：「從心理層面，探討個人與政治體制間互動關係的知識，企圖自個人的認知、情感、態度和行動等各種角度，考察並解釋政治體制本身的穩定和變化。」（頁19）

作者從日常行為角度入手，深入清遺民的內心世界，展示出一幅清遺民與其時代交織互動的圖景。為此，作者仔細地爬梳了大量清遺民與朋友的往來書信、由後人撰寫的清遺民碑傳及墓志銘、年譜與日記等原始史料，將清遺民的政治訴求與身份認同這一宏觀問題放入日常生活的微觀領域考察。在作者看來，「清遺民」的核心特徵是：首先是在民國建立後，對遜清宗室仍舊懷抱忠誠態度；其次，他們內心厭惡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與價值。作者又指出，認定誰是遺民、誰具有所謂遺民的心態，不單是清遺民自我的認同而已，社會輿論所形塑的評價和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面向（頁27-29）。

在鋪墊了清遺民的出處及在民初的世相後，作者先用「遺民看（社會）」的內在理路探索清遺民在行為世界中借助各種象徵性儀式行為表達出的政治認同，再用「（社會）看遺民」的外在理路考察社會輿論如何勾畫清遺民的形象，並將其負面化。這種內外理路相結合的分析視角細膩地揭示出了清遺民與民國社會日趨疏離的變化過程。

民國以降，清遺民多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生活。在租界的保護下，他們從對時局的厭惡

到漸漸與社會隔絕。他們堅持保留髮辮，借僧道衣着對抗民初社會易服現象；他們反對民國以來的陽曆紀念，緬懷陰曆；他們自發組織奉安、萬壽等政治性祭祀與祝壽儀式。通過集體參與編纂《清史稿》與地方志及個人著述，他們將民初政局比作歷史上的五代割據時期，認定綱常倫理與禮義廉恥的喪失與民初政治體系崩塌所導致的社會混亂直接相關。他們認為「君臣」倫常必須保留，為此組織「孔教會」，發起了讀經、刻經等活動。清遺民在行為世界裏的上述表現構建了他們的身份認同感。在這些活動的背後，折射出他們重建理想社會秩序的政治目標（頁219）。

另一方面，民國的社會輿論對清遺民採取了負面的形塑。清遺民的傳統學問在「新學」的衝擊之下日益被視為有「古董化」傾向（頁223-26）。儘管羅振玉、王國維有「趨新」的治學方法，但其學術意義既被「去神聖化」，又受到政治與社會輿論的批評。「遺老」一詞也呈現負面色彩。1925年雙十節宣告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既宣示着民國主權，也意味着清室終結。共和國對帝制皇室的另一種追思，正以學術為由而得到正當性（頁270-71）。

隨着清遺民被社會輿論的負面化形塑，他們在時代的潮流中日趨邊緣，與時代漸行漸遠。而羅志田曾指出，從晚清到民國形成的「尊西崇新」大潮造就了一批從邊緣迅速崛起的「行動」型知識份子（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10）。由此引發

的四民社會解體、鄉村道德淪喪與中國傳統中反智傾向的抬頭等社會劇變，使得清遺民面對江山易幟的大變局，開始對過去進行自我的否定。羅振玉在1932年的自傳中寫到：

予竊意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時竊讀焉。而由今觀之，今日之倫紀蕩盡，邪說橫行，民生沉瘁，未始不由崇拜歐美學說，變本加厲所致。……至是益恍然於一切學術，求之古人記述已足，固無待旁求也。（羅振玉：《集蓼編》，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第二十冊〔台北：文華出版公司，1969〕，頁710-11。）

弔詭的是，羅振玉、王國維、林紓等許多清遺民在晚清都是提倡新思想、推進新教育等開風氣之先者。短短幾十年，曾經的開風氣者對先前自我的徹底否定，令人慨嘆世事莫測。

近年來，許多學者已經開始關注文化保守主義者在近代中國道德與文化層面起到的歷史作用與時代意義。楊國強刻畫出了晚清清流派內心的操守面臨社會鉅變時的焦慮與彷徨，以及其與飛揚跋扈的名士之間漸行漸遠的分裂，二者在晚清動蕩的時局下都變得日益情感化、非理性化，是晚清喪失歷史變革良機的一個誘因（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三聯書店，2008〕）。桑兵注意到民國時期以遺老身份存在的老輩學人對「後五四」一代學人在學術傳承方面起到的積極影響（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

民國以降，有感於儒教式微、王綱解紐帶來的政治與社會的全面失序，清遺民極力抨擊共和政體，希望藉學術與倫理兩條路徑重建社會，其政治取向與文化取向均持保守主義的調和態度。他們從對民初社會與時局抱持的負面態度泛化到對現代西方舶來之文化均持負面看法。而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興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西方文化都面臨嚴重危機之際，因此，文化保守主義者多持文化調和的觀點而絕少固步自封的論調，一方面在維護傳統的基礎上反思傳統，另一方面又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他們的文化取向與政治取向有不同程度的背離。這是清遺民與現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最大區別。

近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大都是文化民族主義者。文化民族主義主張發揚民族傳統文化，提倡民族精神，宣揚愛國主義，以增強民族凝聚力。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思潮呈現出向傳統文化回歸的態勢，是近代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標誌。文化民族主義背後仍然預設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基點，這是其與政治民族主義理念的疊合之處。而被清遺民奉為圭臬的「天下」觀，在民國時期，其合理性與正當性均面臨危機。作者指出了這一時代困境：

當中國只是一個步入世界政治體系之林的國度時，他們〔清遺民〕不能再從道德的觀點來約束自我，而「忠君」的想法不過是虛擬的原則和幻影，因此已無所謂「前朝」的意義。（頁25）

弔詭的是，羅振玉、王國維、林紓等許多清遺民在晚清都是提倡新思想、推進新教育等開風氣之先者。短短幾十年，曾經的開風氣者對先前自我的徹底否定，令人慨嘆世事莫測。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濟，自沉於北平城北的積水潭。九年之後，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這兩次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自沉事件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所捍衛的儒家道德操守對世人的警示。關於梁濟之死，林毓生教授曾指出：

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瓦解，同時導致了(實質意義的)傳統文化與道德秩序的崩潰。於是梁濟不自覺地把儒家的道德價值化約至最普遍的層次，並且提出一個普遍主義式的論點來維護這些價值。但傳統(或傳統主義)的具體行為方式與抽象的理想和價值之間必須存有穩定關係才能使道德保守主義在社會中生存下去。……當傳統中國道德的護衛者放棄了這些抽象理想在社會中特定的具體展現方式的時候，一個在社會上可以成長的道德保守主義便不再被視為當然，也不能重新建立起來了。(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含混性的實例〉，載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250。)

林毓生的研究揭示出扎根於日常生活倫理的儒家道德觀，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重建時所必然遭逢的命運。而本書作者通過梳理王國維自沉引起的眾聲喧嘩，考察社會對於身體終結的殉者如何記憶。清遺民對此事件做出的「道德政治化」解讀正讓位於社會輿論通過強調一個知識份子的人格形象而將其「去道德政治化」的形塑。清遺民堅

持的道德精神喪失了政治場域的發展，正在現實環境下遭受「失語」的處境(頁304-305)。

將林毓生對梁濟之死的「內部考察」與作者對王國維之死的「外部考察」相結合，可以看到，堅持儒家傳統道德操守的清遺民在一個不屬於他們的時代的個人悲劇命運。他們用生命的終結實現了儒家意義上的理想人格，但他們的死不但換不回儒家「王道理想國」的重建，反而使他們在時局的變異下誤入了效忠國家抑或朝廷的兩難歧途。

1920年代，逐漸壯大的赤化潮流開始席卷中國各界，清遺民亦無法置身事外。他們在這場時代劇變裏被視為妨礙社會進步、阻撓人民的「反動者」，飽受身家性命之危。伴隨革命所到之處引起的巨大社會動蕩使他們惶恐不安，尋求解決之道。為了因應這套外來的思想學說(馬克思主義)，他們從傳統的思想資源中尋找武器，表示惟有孔孟學說才足以克服(頁313)。

而1930年代日本策劃建立「滿洲國」實含反共的基調。因此，對於清遺民而言，參與滿洲國是他們面對現實環境下，不得不然的抉擇或取向：既為了防止「共產赤禍」，也是為了完成復興清室的夢想(頁320)。滿洲國成為提倡「王道」的鄭孝胥等人心目中的「理想國」。儘管如朱益藩等參加滿洲國的清遺民竭盡全力維護自主權，但在軍國主義瀰漫的陰影下，「王道理想國」最終淪為日本「以華制華」的工具。清遺民為了扭轉民國以降日益沉淪的社會秩序與恢復中興帝制做了種種努力。然而，在1930年代這個因民族

1930年代日本策劃建立「滿洲國」實含反共的基調。對於清遺民而言，參與滿洲國是他們面對現實環境下不得不然的抉擇或取向：既為了防止「共產赤禍」，也為了完成復興清室的夢想。

危機籠罩的陰影而日益走向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融合的新獨裁統治的時代中，他們的努力終將無力回天。

研究美國南北戰爭的唐納德 (David H. Donald) 認為，「治史者往往跟隨勝利軍隊的營帳而行」(Henry S. Commager, *The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Books, Inc., 1965], 47-48)。那些經歷了王朝易代的遺民，因背負了前朝的烙印，注定在新朝的歷史書寫中處於陰暗角落。在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新時代」，道德失範與社會斷裂的隱患

被掩蓋在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中的一員，參與世界、分享利益的樂觀表述中。在為當代「現代化」發展尋求(抑或只是提供?)歷史論證的「研究成果」屢見不鮮之時，作者獨闢蹊徑，用歷史多稜鏡聚焦於這群長期被「現代」話語負面表述的清遺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去理解這個經歷了從「帝制」到「共和」之大變局的群體，在一個日益「現代」的社會中的內心彷徨與焦慮。他們注定被時代的洪流淹沒而無法成為弄潮的舵手。而他們對時代的冷眼洞察，在百年以後的今天，依然具有發人深省的穿透力。

作者獨闢蹊徑，用歷史多稜鏡聚焦於這群長期被「現代」話語負面表述的清遺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去理解這個經歷了從「帝制」到「共和」之大變局的群體，在一個日益「現代」的社會中的內心彷徨與焦慮。

史料共鑒別 疑義相與析

● 盧 毅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近日讀到秦福銓著《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以下簡稱《博古和毛澤東》，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作者是博古(秦邦憲)的侄子，該書是其遺著，主要記述了他從父親楊琳(即博古之弟秦邦禮)和潘漢年、嚴樸等知情人那裏聽來的「歷史故事」。筆者讀後，覺得這是一部頗有意思的口